

诗人陆志韦

研究及其诗作考证

赵思运
■ 著



陆志韦（1894—1970），本名陆保琦，浙江湖州吴兴县人。先后毕业于东吴大学、芝加哥大学，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燕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就职。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学家，还是中国新诗史的源头性诗人。他关于白话诗的本体性的思考与实践，开启了徐志摩、闻一多等人的新格律诗运动。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结题成果(课题编号: 11JCZW04YB)

诗人陆志韦研究及其诗作考证

赵思运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南京·

内容提要

陆志韦(1894—1970),浙江湖州南浔人。作为心理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学家的陆志韦,已经被深深地楔入历史,而作为白话诗人的陆志韦在新诗史上却长期是一个失踪者。《诗人陆志韦研究及其诗作考证》把陆志韦置于东南大学新诗谱系的视野中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考察了陆志韦精神文化人格的生成、陆志韦诗论的独特贡献、陆志韦的诗歌创作价值,并对其诗作进行考证整理,为进一步研究诗人陆志韦提供了很多罕见资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人陆志韦研究及其诗作考证/赵思运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 12

ISBN 978 - 7 - 5641 - 3997 - 1

I. ①诗… II. ①赵… III. ①陆志韦(1894—1970)—人物研究②陆志韦(1894—1970)—诗歌研究
IV. ①K825. 5②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9511 号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南京四牌楼2号 邮编:210096
出版人:江建中
网 址:<http://www.seupress.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15
字 数:286千字
版 次: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1-3997-1
定 价:48.00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025-83791830

序

姜耕玉

21 世纪的中国新诗研究,语言不能不成为焦点问题。

我敬佩王国维与众不同,在众多学者投身五四运动中扮演弄潮儿而声名显赫,王国维却在寂寞中默默地做着架桥的工作,用西方现代哲学文化精神点燃中国文化资源,激活中国文学思想,故有论者称他“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周锡山《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前言》)。这一磨砺于中西文化汇合之源的“灵光”,无疑是迥然有别于五四文学变革的激进主义的另一道风景线。

当时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发起诗歌革命,以新诗打倒旧诗,达到诗体变革的目的,无可非议,但汉语诗歌断裂,新诗执意背离积淀了几千年的汉语诗意资源,而成为无土之花,失去独到精妙的汉语风韵。南京东南大学胡先骕、吴宓教授曾对北京新文化运动中颠覆传统的极端主义,进行过尖锐批评,然而,却遭来“保守主义”的帽子。东南大学正是以守护中国文化的氛围,聚集了李瑞清、李叔同、胡先骕、吴宓、吴梅等一大批著名学者、诗人、画家,被称为国学大本营。也正是在富有国学氤氲的环境里,二三十年代东南大学新诗研究,从陆志韦、李思纯最早对新诗体的思考,到闻一多、徐志摩的新格律主张,都是以匡正新诗弊端的形式建设为特征。李叔同、陆志韦、宗白华、闻一多、徐志摩、陈梦家等先驱们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承传汉语诗歌的基因方面做出了努力。闻一多、徐志摩的新格律理论,已鼎立于新诗史上,研究者甚多,而陆志韦、李思纯的新诗形式主张,似鲜为人知。朱自清称陆志韦是“第一个有意实验种种体制,想创新格律的”,“他的诗也别有一种清淡风味”,“但也许时候不好吧,却被人忽略过去”(《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由此看来,思运教授书稿《诗人陆志韦研究及其诗作考证》,终于表明有学者问津“第一个有意实验种种体制”,而且对于匡正当下新诗弊端,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

赵思运提出“东南大学新诗谱系”,陆志韦是这一谱系中的第一人。“这一谱

系书写了强调中国新诗形式建构的传统,从而迥异于北京大学新诗谱系所奠定的颠覆与反叛传统”。思运对主流新诗中颠覆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倾向的分析,颇为深刻。他认为:“新诗之所以发生在北京大学,具有鲜明的政治表演性。因为在那个时候,革命与反叛成为一种必须的姿势,而不是新诗建设的必需。在价值立场上,他们普遍崇尚文化进化论,所以特别强调反叛与颠覆。”他还以泰戈尔在东南大学与北京大学讲学的截然不同的境遇,发掘其原因是“一为文化至上,一为政治激进。泰戈尔虽然是印度的诗界革命的旗手,但他的革命不同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的诗歌革命,而是带有改良色彩的文化革命”,泰戈尔在东大体育馆讲演的空前盛况,正是相通共融的东方文化气息的诗意奇迹。陆志韦与东南大学新诗谱系,对胡适创立的新诗,采取了温和的“补天”态度,思考与探索如何使在一张白纸上诞生的新诗自我健全完善起来。

作为个案研究的专著《诗人陆志韦研究及其诗作考证》,既致力于诗学分析,又吸取了胡适的实证主义的方法,从翔实材料取证与整合中,凝练观点,显示其切实的理论分量。赵思运对胡适避其所短,扬其所长,值得称道。胡适先生毕竟是多有建树的天才。陆志韦 1915 年留学美国,专攻心理学,1920 年回国后转向语言学研究,是语言学家。他在早期白话诗创作实践中,对新诗形式就开始思考与探索。他在《渡河》自序《我的诗的躯壳》中,提出了新诗语言形式建设的核心理论——节奏问题。“我并不反对把口语的天籁作为诗的基础,然而口语的天籁非都有诗的价值,有节奏的天籁才算是诗。”“诗的美必须超乎寻常语言美之上,必经一番锻炼的工夫。”他主张在诗的节奏上,“舍平仄而采抑扬”,“节奏千万不可少,押韵不是可怕是罪恶”,并提出押活韵的规则。陆志韦的新诗“节奏”论,深入揭示了汉语诗美的特质,具有新诗形式建设的重要理论价值。

思运是颇有思想与才华的诗家,一直立足于诗坛前沿,常有弄潮儿的姿势。他能够潜心于早期白话诗家陆志韦研究,并对陆志韦零散发表的诗作以及散佚民间的诗集,进行了细致的追索、考证与编辑,彰显了中国新诗史上一个理论上的被遮蔽者、一个诗人的失踪者,堪称对新诗史的有功之臣。我虽然是思运的合作导师,但忙于其他杂事,很少问津,实感惭愧。我俩诗友之情是珍贵的。我相信在本世纪中国新诗建设中,思运教授会有更多的力作呼之欲出。

是为序。

姜耕玉

2013 惊蛰于秦淮河边

目 次

上部 诗人陆志韦平议

第一章 东南大学新诗谱系中的陆志韦	(3)
第一节 主流新诗史中的激进主义倾向	(3)
第二节 呼之欲出的“东南大学新诗学派”	(6)
第三节 陆志韦：五四时期东南大学硕果仅存的诗人	(14)
第二章 陆志韦精神人格及文化思想	(17)
第一节 陆志韦的精神人格	(17)
第二节 陆志韦的文化思想	(22)
第三章 陆志韦诗学思想	(28)
第一节 《渡河·我的诗的躯壳》	(28)
第二节 用白话写作	(32)
第三节 《论节奏》	(45)
第四节 《白话诗用韵管见》	(48)
第五节 《试论杜甫律诗的格律》	(50)
第四章 陆志韦的诗歌创作	(53)
第一节 《不值钱的花果》及《渡河》	(53)
第二节 《渡河后集》	(74)
第三节 《申西小唱》	(76)
第四节 《杂样的五拍诗》	(80)

第五章 陆志韦生平与著述	(88)
--------------------	------

下部 陆志韦诗作考辑

陆志韦诗作目次	(105)
不值钱的花果	(110)
渡河	(155)
渡河后集	(183)
申西小唱	(203)
杂样的五拍诗	(219)
集外	(228)
参考文献	(230)
跋	(233)

上部

诗人陆志韦平议

第一章 东南大学新诗谱系中的陆志韦

新诗已经九十岁了,但是它的身体里充满着躁动、惊悸与紧张,“打倒”、“pass”的呼声不绝于耳,颠覆与反叛成了主流。20 世纪初的革命情结从政治上的叛逆波及思想、文化乃至整个诗学传统的颠覆;一直到 80 年代,“先锋”竟然成了最时髦的主流文化,21 世纪初,“先锋到死”的口号似乎成为突破诗歌困境的出路。接近一个世纪了,现代汉诗一直没有来得及反刍自己的基因是什么,没有反思自己到底从哪里来,自己是谁,要到哪里去。因此,非常有必要深切反思诗歌本体的建构以及建构的基点问题,思考汉诗智慧何以失落、如何回寻。当我们回望 20 世纪中国新诗史和学术史的时候,便会深深地凝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南大学新诗先驱的身影。陆志韦(1894—1970)、李思纯(1893—1960)、宗白华(1897—1986)、徐志摩(1897—1931)、闻一多(1899—1946)、梁实秋(1903—1987)、陈梦家(1911—1966)、方玮德(1908—1935)、汪铭竹(1904—1989),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构成了“东南大学新诗谱系”。这一谱系书写了强调中国新诗形式建构的传统,从而迥异于北京大学新诗谱系所奠定的颠覆与反叛传统。长期被冷落和遗忘的陆志韦,不仅是东南大学新诗谱系中的源头性诗人,也是中国新诗史上重要的诗人。

第一节 主流新诗史中的激进主义倾向

新诗诞生于北京大学已经成为常识,但是其发生的合法性也一直受到质疑。我们有必要探究:在看到其合法性的同时,它又有什么局限?

20 世纪的中国盛行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如革命与保守、破坏与建设、内容与形式。在二元对立的取舍中,深受意识形态的侵蚀与干扰,导致文

学—诗歌史的写作也深受这一思维方式影响。因此,新诗史也充分叠映出意识形态的发展史。这样,新诗在它的发生期就奠定了具有革命性质的起点,即具有政治意义和革命意义的诗歌成为正宗,于是文学启蒙压倒了形式建构,政治上的革命论和进化论的倡导与鼓吹,使众人认为一切的文化、文学、艺术都应该以革命姿态彻底颠覆传统。于是政治革命与思想启蒙更多的时候演化成了与传统文化断裂的行为。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地处中国政治中心的北京大学所建立的新诗传统成为独尊的一元导向。

新诗之所以发生在北京大学,具有鲜明的政治表演性。因为在那个时候,革命与反叛成为一种必须的姿态,而不是新诗建设的必需。在价值立场上,他们普遍崇尚文化进化论,所以特别强调反叛与颠覆。考察北京大学《新青年》作者群和新诗鼓吹者,便会发现,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的经历和他们精神人格中具有浓厚的革命性基因。

比如说陈独秀(1879—1942),他的革命历程很长。陈独秀 1901 年在日本参加“励志会”,1902 年参加革命团体“青年会”,1903 年组织“爱国会”,1904 年加入“暗杀团”,1905 年任“岳王会”会长,1907 年组织“亚洲和亲会”,后参加了武昌起义,组织了第二次革命、第三次革命,还参加了“政余俱乐部”、“欧事研究会”。李大钊参加了革命团体“共和会”、武昌起义“敢死队”,组建过“中国社会党”、“北洋法政会”,还参加了中华学会等政治团体,参加过反袁运动。刘半农参加过青年团起义革命军,因为一直与陈独秀交往甚密而调往北京大学教书。沈尹默也是由于与陈独秀一直交往甚密而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钱玄同参加过“同盟会”。鲁迅参加过具有鲜明革命色彩的“浙学会”和“光复会”。这些五四革命人士经历中的革命情结影响着他们对于文化、文学、诗歌的态度。《新青年》同人越来越倾向于政治活动。

陈万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考证道:“1923 年 2 月第九卷以至 1926 年 7 月,《新青年》更成为中共中央的纯理论机关季刊了。”^①他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还得出一个结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指导势力不仅不是辛亥革命之外的力量,而应是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指导势力与辛亥革命运动也不是两个世代,而是同一世代人;两个运动在人物谱系上有一种承接的渊源。”^②如果进一步考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政治情结、政治状态和政治态度强烈地影响到诗歌的态度,尤其是对于古典诗歌的激进反叛。五四时期,无论主流诗坛还是主流诗歌史的写作,都体现了与传统诗学断裂的决绝性和诗歌创作的

①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19 页。

②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57 页。

过度西化。这使得中国新诗自从一诞生便失去了汉语的根性。

我们可以从泰戈尔来中国讲学的遭遇看出东南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不同态度：一为文化至上，一为政治激进。泰戈尔虽然是印度的诗界革命的旗手，但是他的革命不同于五四时期中国的诗歌革命，而是带有改良色彩的文化革命，他宣扬东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反对暴力，鼓吹博爱与和平。1924年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诚邀泰戈尔到东南大学演讲，泰戈尔久闻东南大学学风很盛，欣然同意。泰戈尔讲学所在的东南大学体育馆人山人海，几乎无插足之地，到会的中西人士有六七千人，总体而言演讲非常成功。而泰戈尔的北京讲演在收获些许鲜花的同时，也遭遇了尖锐的荆棘。在他做的几场演讲过程中，一直有人散发传单，疾颜厉色要送他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翘楚和左翼文化人士如陈独秀、郭沫若、沈雁冰、瞿秋白、吴稚晖、林语堂、鲁迅等都对他表示极力的批判！陈独秀竟骂“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吴稚晖则请泰戈尔把“尊口”封起来！林语堂对泰戈尔也有诛心之论。这些都令泰戈尔感到非常灰心，不得不中断演讲计划，提前结束，失望地告别北京。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最宏大的价值观念即是“革命”，对待古典文化，多采取颠覆态度。白话文写作更多的是一种“反封建”的姿态，乃至一种工具，而无暇顾及诗歌文体意义和诗歌自身的规律性的东西。只要站在革命立场，即使不作新诗、不懂新诗的人也可以随便表态。钱玄同在胡适《尝试集》初版序言（1918年1月10日）的末尾说：“我自己是不会作诗的人……不过我也算一个主张白话文学的人”。^①确实，钱玄同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对新文学的态度，一种主张，而不是出于诗歌本体的考虑。他在序里推举胡适的《人力车夫》、《一念》和《老鸦》三首诗“都用‘长短无定’，极其自然的句调了”。其实，这三首诗的艺术功力并不高。胡适自己也有清醒认识，在《尝试集》四版里，他只保留了《老鸦》，另外二首删除了。比较一下沈尹默和胡适的同名诗作《人力车夫》就可以发现高低。即使胡适认可的《老鸦》，所表达的个性独立的思想与沈尹默的《月夜》是一致的，但是二者的艺术水准仍然有很大的差别。钱玄同之所以看重这三首诗，大概主要依据它们在句调的“散”上超过其他的诗作，这三首诗歌在形式上的“散”离古典诗词的形式越远，就越具有革命精神。虽然陆志韦的《渡河》与五四新诗人一起出版，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此时的新诗还面对着守旧派的强大势力。1923年周灵均在北京星星文学社《文学周刊》第17号发表文章《删诗》，批评了8部诗集，分别是陆志韦的《渡河》，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朱自清、徐玉诺、郭绍虞、叶绍均、刘延陵、郑振铎合

① 钱玄同序《尝试集》，胡适《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

集《雪朝》、汪静之的《蕙的风》，对这些新诗集一概以“不佳”、“不是诗”、“未成熟”等论断予以否定。^①诚然，此时的诗坛有必要集中力量对顽固派予以反击，为新文学伸张。但是，切不可“以态度”来作为判断一切的标准，因为“革命等于进步”的意图伦理是缺乏辩证精神的。

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到1924年掀起大革命浪潮，新文化运动大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方向。此后，“新青年”群体所蕴含的革命激进主义思想随着党文化的强化和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也不断地向前推进，一直贯穿到20世纪末。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郑敏等人开始彻底反思诗歌史的这一弊端，陆志韦才开始在姜耕玉、解志熙、陆耀东、沈用大等人的著述中出现。较早认识到五四时期新诗缺陷的是郑敏。1993年她的论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②挑起重要论争，使这一问题浮出地表。她认为，文言和白话同属汉语母语，文言诗词的诗性信息非常丰富，是新诗的重要资源，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人激进的反传统姿态，使汉诗处于文言与白话的三元对立之中，给新诗带来很大负面影响。《诗探索》杂志在1996年连续发表关于“字思维”的文章，探讨汉字与汉诗的关系，意在对象汉语的诗性予以重新体认。1997年东南大学与诗刊社举办《'97中国新诗形式美学研讨会》，与会学者对新诗形式进行了反思，重温陆志韦等诗坛先驱的诗学观点。2005年，姜耕玉的《汉语智慧：新诗形式批评》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扉页上写有：“谨以此书纪念诗坛先驱陆志韦、宗白华、李思纯先生”。他提出了“汉语诗性智慧说”，并以此作为探讨和疏通古今汉诗语言艺术之间相续相生的基因，在寻根探源中发掘汉语诗美的质素，激活与点燃其潜在的诗性智慧，则更加体现了现代汉诗的理论自觉，可以作为汉诗理论建构的新的生长点。

第二节 呼之欲出的“东南大学新诗学派”

实际上，新诗史的本来面目并不像一般意义上所了解的那样只是对传统的简单颠覆。在丰富驳杂的历史面貌中，我发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南大学的新诗先驱所凝练出来的另一个新诗传统——重视新诗本体的建构。

与北京大学那种浓厚的革命氛围相对应，作为国学大本营的东南大学则显示

① 项文惠《广博之师——陆志韦传》，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②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出秣妍的文化氤氲。这里有吴宓主持的《学衡》和柳诒徵主持的《史地学报》，书画艺术的一代宗师李瑞清，美学大师宗白华，绘画大师徐悲鸿、吕凤子、陈之佛、傅抱石、吴作人、张大千等，戏曲研究和教育家吴梅、音乐教育家李叔同，构成了云蒸霞蔚的东大传统艺术底蕴。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吴宓对以北京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颠覆传统文化中所显示出来的激进态度进行猛烈批判，试图起到纠偏的作用，不幸被激进的力量蔑为“保守主义”。尽管如此，20 世纪 20 年代，仍然有大批教授如陆志韦、李思纯、宗白华、闻一多、梁实秋、徐志摩等或先后、或交叉地来到东南大学执教。陆志韦、李思纯、宗白华的诗学主要从传统国学中获取资源，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则从西方诗学中汲取营养，加之闻一多、徐志摩所教东南大学学生诗人陈梦家、方玮德，以及 40 年代的汪铭竹，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构成了“东南大学新诗谱系”。

他们在东南大学执教或求学的起止时间为：

姓 名	身 份	东南大学当时名字	起止时间
陆志韦	心理学系主任、教授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	1920—1927
李思纯	西洋文学系教授	东南大学	1923—1924
宗白华	哲学系主任、教授	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	1925—1952
闻一多	外文系主任、教授	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1927—1928
梁实秋	外文系教授	东南大学	1926—1927
徐志摩	外文系教授	东南大学；中央大学	1927—1930
陈梦家	法律系学生	东南大学；中央大学	1927—1931
方玮德	外文系学生	中央大学	1929—1932
汪铭竹	哲学系学生	东南大学；中央大学	1927—1931

东南大学新诗谱系的重大贡献是，共同纠正、消解着以北京大学为主体的彻底颠覆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传统，而致力于新诗本体形式的建构。他们远离革命中心北京，其文化态度与个人精神人格的特征也是远离革命立场的学术立场或者诗学立场。东南大学的新诗先驱们从来没有把西方诗歌和古典诗歌当作两大阴影，而是在古典诗学与西方诗学两翼的对接中寻找汉诗自身的建设，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强调汉语性，在古今语言的比较中突出现代诗形与智慧。

北京大学新诗先驱与东南大学新诗先驱，同样举起火把，但是，北京大学的火把由文化之火转变为政治之火，内核是革命理念，东南大学的火把始终是学术之火，学术成为安身立命的存根。文学史关于胡适的评价所秉持的唯一标准不正是“革命”吗？当胡适和陈独秀一起鼓吹文学革命的时候，胡适的历史地位则被大书

特书,但是,自从他转向整理国故时起,便被历史屏蔽掉,进而被扫进了“垃圾堆”!在激进的反文化潮流中,东南大学的文化声音似乎是微弱的。新诗史的书写最终选择了北京大学的富有革命意味的激进主义传统,而东南大学先驱被冠以“保守主义”的帽子被诗史边缘化,从而在新诗史上失踪了。

文化、文学、诗等具有相对稳定性和自身的发展规律,不像政治思潮在特定阶段急剧变化更迭。正是由于东南大学的新诗先驱们更多地秉承非革命精神姿态和文化立场,他们在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中和古今迁移中做出了诗学抉择,往往更多地在国学底蕴中承续中国传统诗艺。可以说,国学底蕴构成了东南大学新诗发生的文化底色。陆志韦、李思纯、宗白华等都曾经留学欧美,但是他们吃了羊肉并没有变成羊,还是流淌着民族的文化血液,在普遍流行革命与颠覆的时代,他们有着以诗型建构为核心的共同的追求——坚持汉诗的文化理想主义,主张在内在的精神人格与外在的形式建构相统一中生成意境之美与汉语智慧。

陆志韦、李思纯、宗白华之所以被诗歌史遮蔽,还有更主要的一个背景因素,那就是他们处于国学积淀非常深厚的东南大学。在思想文化界崇尚革命与反叛的五四时期,东南大学似乎理所当然地被认定为保守,保守就意味着政治反动。然而,当我们拭去历史的尘埃,就会彰显出陆志韦、李思纯、宗白华以及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对于激进文化思潮的纠偏意义。

陆志韦笃信基督教,这对革命观念具有很大的解构力量,他在诗集《渡河》序言《我的诗的躯壳》中明确表示诗歌的态度:诗歌不要成为党派的工具。

李思纯是《学衡》重要成员,他在《论文化》^①中表达了文化本位的立场。他反对文化与诗学上的历史进化论,强调在中西文化对比中,彰显民族文化自身的价值。李思纯的主要发表园地有二:一是所谓的保守主义大本营东南大学的学术文化杂志《学衡》,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少年中国》。这似乎意味着李思纯的精神立场处于国学传统派与五四新潮派之间。他一方面关注着新诗的发展,1920年6月12日在《致宗白华的信》中称赞新诗“一日千里的进步”,^②另一方面,又反对那种只重精神不重形式建构的倾向,因为“诗的本体,不外是两方面。一面是属于思想的,所谓文学的内容。一面是属于艺术的,所谓文学的外象”^③。他能够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界定诗歌的本体,可谓是为新诗的建构开了先声。而且,在流行把白话等同于白话诗的口号声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新诗普遍存在的单调幼稚的问题,从而倡导“深博美妙复杂”的诗学境界,显现出对当时诗坛

① 李思纯《论文化》,《学衡》1923年10月第22期。

② 李思纯《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少年中国》1920年第2卷(6)。

③ 李思纯《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少年中国》1920年第2卷(6)。

的敏锐洞察与传统诗学的深厚积淀。

宗白华出生于安庆的书香家庭,桐城派后代方令孺是其姨妈,著名诗人方玮德、学者舒芜都是他的表弟。宗白华的诗歌古典韵味更为浓厚。他在《我和诗》中写道:“唐人的绝句,像王、孟、韦、柳等人的,境界闲和静穆,态度天真自然,寓秾丽于冲淡之中,我顶欢喜。后来我爱写小诗、短诗,可以说是受了唐人绝句的影响,和日本的俳句毫不相干,泰戈尔的影响也不大。”^①所以,他的《流云小诗》虽然写于德国,但显现的却是典型的东方古典意境之美和天人合一的神韵。他和郭沫若虽同为《三叶集》的作者,但是诗风非常不同。郭沫若天狗般狂奔的思维和汪洋恣肆的诗情往往扼杀了诗的形式建构,而宗白华则予以提醒:“我很愿意你一方面多与自然和哲理接近,养成完满高尚的‘诗人人格’,一方面多研究古昔天才诗中的自然音节,自然形式,以完满‘诗的构造’,则中国新文化中有了真诗人了。”(1920年1月3日给郭沫若的信)^②“我觉得你的诗,意境都无可议,就是形式方面还要注意……你的诗又嫌简单固定了点,还欠点流动曲折,所以我盼望你考察一下,研究一下……你小诗的意境也都不坏,只是构造方面还要曲折优美一点,同作词中小令一样。要意简而曲,词少而工。”(1920年2月给郭沫若的信)^③他在《新诗略谈》里再次表达了对于形式建构的重视,认为诗歌创作要“用自然的形式,自然的音节,表写天真的诗意与天真的意境……优美的诗中应该含有音乐和画境”。^④

我们可以简单比较一下《三叶集》的三位作者田汉、郭沫若、宗白华后来的分化。三位志同道合的诗人最后的选择大相径庭。郭沫若和田汉越来越倾向于革命,因此田汉对宗白华颇有微词:“比如我的老友,与我及郭沫若同写《三叶集》的宗白华兄,何以最近几年往来于讲台研究室外不写一字,除了直接受他教诲的学生以外,谁也不能得到他一点影响,只偶然看见他与中大徐悲鸿教授发表请国府保存栖霞古迹的宣言呢?……他教的是美学,但他在中大那种环境,敢越出Bourgeoisie(即资产阶级)的美学一步讲Proletariat(即无产阶级)的美学吗?”^⑤

如果说,陆志韦、李思纯、宗白华在新诗领域基本上属于各自为战,那么,在20年代后期,闻一多、梁实秋、徐志摩,以及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学生陈梦家、方玮德等构成了相对严谨的“东南大学诗群”。他们正是“新月派”的主力干将。在东南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时期,他们的诗学观点一脉相承,互相

① 宗白华《我和诗》,《流云小诗》,上海:正风出版社,1947年。

② 宗白华《三叶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③ 宗白华《三叶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④ 宗白华《新诗略谈》,《宗白华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

⑤ 李辉《田汉:狂飙中落叶翻飞》,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页。

映衬,正是“新格律诗学”的胚胎。

闻一多从小喜爱古典文化。1912年,他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打下了非常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后来出版了《楚辞补校》、《神话与诗》、《古典新义》、《唐诗杂论》、《离骚解诂》等学术著作。因此,他的新诗主张,虽受西洋文学的影响,但是逐渐扬弃西方浪漫主义那种以汪洋恣肆的诗情冲决艺术规范的弊端,而是将西方的唯美主义与中国传统诗学的锤炼结合起来,力求诗歌艺术形式的完美。在新诗形式的探索方面,闻一多既善于吸收西方诗歌音节体式的长处,又注意保留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传统,提出了一套创造新格律诗的理论,也就是闻一多著名的“三美”主张:主张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①诗集《死水》就是他的艺术主张的实践。

徐志摩是主张新诗格律化运动的又一重要人物。徐志摩在英国留学的两年间,受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崇尚西方资产阶级倡导的平等、自由。他称自己“是一个有过单纯信仰的人”,胡适则把这种“单纯信仰”简单地概括为“爱”、“自由”和“美”。这三个元素就构成了徐志摩诗的主旋律。陈西滢认为《志摩的诗》一书“几乎全是体制的输入和试验”(1927)。^②徐志摩的诗的形式变化多样,有长诗、短句、自由诗、散文诗,更多的是对西方的诗式进行试验。他的诗式的试验和诗歌技巧的磨炼,体现了鲜明的文体意识。

梁实秋于1926年7月至1927年春在东南大学任教,时间并不长。为什么把梁实秋划归东南大学新诗谱系?这是因为,在这之前之后,梁实秋的思想观点和诗学观点以及梁实秋的思想形成的资源,都与东南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沈卫威把梁实秋称为学衡派的外围成员,是有道理的。1926年梁实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之后,由梅光迪介绍引荐,被南京的东南大学聘为文学教授。梅光迪、吴宓、梁实秋均为白璧德的崇拜者,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资源,有着大致共同的文化观点。

当一般的新诗人仍然停留在叫嚣文学观念、叫嚣文学解放的时候,梁实秋已经发现了新诗自身的问题,包括自身的艺术问题和新诗语言艺术的音韵问题。他说:“我们用白话作诗,若能按照艺术的安排,音乐的方法,当然可以产生出最完美的声调。没有一种艺术不是征服工具的困难的;白话既是我们作诗的正当的工具,便应该努力征服他的困难,我相信新诗的音韵问题,诚有待于几个真正的先锋

① 闻一多《诗的格律》,《闻一多全集》第3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② 陈西滢《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西滢闲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